

引用:安齐煥,李和伟.简帛医书中动物药的应用特点[J].中医药导报,2026,32(1):246-250.

简帛医书中动物药的应用特点^{*}

安齐煥,李和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 简帛医书是珍贵的中医药文化遗产和原始文献资料,记载了十分丰富的药物学内容。文章从简帛医书中动物药的种类、炮制方法、剂型和主治功效4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整理,从中研究动物药的应用特点。先秦到两汉时期,动物药的发展从原始朴素走向深入探索,体现在药物种类、用药方法等方面。

[关键词] 简帛医书;动物药;应用特点;医药史

[中图分类号] R2-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6)01-0246-05

DOI:10.13862/j.cn43-1446/r.2026.01.041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 Medicines in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Books

AN Qihuan, LI Hewei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China)

[Abstract] The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books are preciou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al heritages and original documentary materials, recording extremely rich pharmacological contents.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animal medicines in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books from four aspects: types, processing methods, dosage forms and main therapeutic effects, so as to study their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medicines evolved from primitive simplicity to in-depth exploration,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types of medicines, medication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Keywords]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books; animal medicines;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medical history

动物药具有独特的药用价值,是中医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临床常用的中药材约300余味,其中动物药约占10%^[1]。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51味动物药材,收载含动物药材中成药品种504种^[2]。

自20世纪初以来,我国在不同地区先后出土了涉医简帛文献,为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医药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3]。石可金^[4]对《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的动物药进行了研究;石开玉^[5]对《五十二病方》的禽类药进行了考证;陈勤^[6]对《五十二病方》中动物药的应用作了初步探讨;刘晓仪^[7]对出土简帛文献中动物药的服用方法和炮制方法进行了研究;王铭农^[8]研究了历代本草学中动物药的发展概况。但目前关于简帛文献中动物药的综合性研究鲜见,本文选择与药物学相关的出

土文献,以动物药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探析动物药应用发展的情况与特点,以期探析先秦两汉时期对动物药的认识和应用概况,补充先秦两汉时期医药史。

1 动物类药物的数目与种类

出土简帛中与药物学相关的主要有:周家台秦简《病方》、马王堆汉墓医书、阜阳汉简《万物》、武威汉代医简、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及天回医简。其中,天回医简中载录了治疗六十种病的医方,整理定名为《治六十病和齐汤法》^[9]。整理查阅以上文献可以了解先秦至两汉时期出土文献中动物药的应用情况。

1.1 种类丰富,取材广泛 经过笔者查阅与整理,去除重复药物,以上9部出土简帛文献中共计137种动物药,具体见表1。在当时的社会与医疗环境下,人们取用日常生活中的动物用

*基金项目: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规律与策略研究(19YJA710018)

通信作者:李和伟,男,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

以治疗疾病并且充分利用。至战国时期,牛羊已成为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10]。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动物药的种类丰富。137种动物药中,包含兽部药67种、虫部药30、禽部药17种、鱼介部药14种及人部药9种,以兽类药为主。秦汉时期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各个地域的用药经验受限于自然资源,动物药的种类在不同简帛医书中有所差异。《五十二病方》和阜阳汉简《万物》出土于楚地,《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出土于蜀地^[11]。两地均地处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潮湿。《墨子·公输》称楚地“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富”,以上简帛文献中均可见鱼介类入药。如:《五十二病方》中用鲋鱼治疗牝痔;《万物》W018号简载“魚與黃土之已痔也”^[12];《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用鲤鱼治疗疾病。而出土于西北地区的《武威汉代医简》中的陈骆苏、白羊屎也体现出独有的西北地区特色^[13]。

1.2 常见的动物药 据笔者统计,出现2次以上的动物药有动物脂肪(54次)、溺(9次)、蜜(9次)、胶(7次)、人发(5次)、桑螵蛸(4次)、牡蛎(4次)、牛胆(3次)、牛肉(3次)犬胆(3次)、羊矢(3次)、鸡卵(3次),其余动物药仅出现1~2次。总体上动物药重复使用的次数不多,将常见的动物药分类归纳,兽部药包括动物脂肪、胶、牛胆、牛肉、犬胆、羊矢;虫部药包括桑螵蛸、蜜;禽部药包括鸡卵;鱼介部药包括牡蛎;人部药包括溺、人发。

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中,部分动物药仍然沿用并且被探索出新的应用,如蜜在出土医书中被用于治疗久咳上气,现代临床还将其用于治疗脘腹虚痛;简帛医书中记载桑螵蛸可治疗耳部、脘腹部脓肿,“蜱蛸、杏覈(核)之已癰耳也”^{[12][39]},现代临床则较少用于治疗化脓性疾病,多用于治疗遗精遗尿、

尿频及小便白浊等。此外,许多动物药如今已经少用或不再使用,随着人们认知观念的进步与新的药物不断被发现,部分动物药(如男子泊、头脂、死人肪骨等)被淘汰是历史必然。出土文献距今年代久远,部分动物药可能由于疗效欠佳、取材不便、文字传抄有误等因素被后世医家弃用故少见于后世医书中,不再使用。现代临床尤为重视动物类中药材开发与利用的卫生、安全问题,部分药物因疗效缺乏科学验证且替代药物丰富,如动物排泄物类的溺、羊矢、鸡矢、犬矢等,基本不再应用于临床。

2 动物药的炮制

动物药的药用部位取材范围涵盖动物全体、骨骼、内脏、血液及排泄物等,存在易腐变质、气味腥臭、毒性成分、质地坚硬等难以入药的问题,必须经过炮制后方可使用。出土简帛文献中动物药涉及的炮制方法有治、屑、牒、刲、洗、渍、燔、炙、煮、烹及干燥等,可根据现代炮制分类方法“五类分类法”进行归类。整体炮制方法较为简单,仍处于发展阶段,最常用的是修治法与火制法,主要目的是便于贮藏、使用、析出有效成分及矫味矫臭。

2.1 修治法 修治法为纯净、粉碎、切制药材,简帛医书中包括治、屑、牒、刲。治,粉碎药物的一种方法,在简帛医书中使用频率最高。药物治后便于服用且有利于人体对药物的吸收。《五十二病方》中记载“取鼢鼠,乾而治”、“治厲(蠣)”。《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简54载“治龍骨以傅傷”^{[14][10]}。牒,《说文解字》载:“薄切肉也。”^[15]刲,《说文解字》载:“刲,切也。”^[15]《治六十病和齐汤法》载“取狗肝,薄葉(牒)之”^{[14][108]}(95号竹简)、“治取羊肝腸胃,謹滌(洗),細刲之”^{[14][122]}(173号竹简),意为将狗肝

表1 简帛医书动物药药物表

简帛医药文献	禽部	虫部	鱼介部	兽部	人部
阜阳汉简《万物》	燕矢、石鼠矢、鳩鸟、蜜、蜱蛸、蜘蛛、蟆、蚕卵、龟、牡蛎、鱼、鮑鱼、久膏、蕕膏、羊、羶膏、牛胆、羖羊、彘膏、穀中膏、犀、鼯、鼠脑	宿鸟	土蝼、蚕	蚍蜉、鳖	
《五十二病方》	三宿雄鸡、白鸡、鸟	蜗牛、蚕卵、蜂卵、食衣白	鲋鱼、彘鱼、鱠鱼血、	羊肉、羊矢、羖羊矢、肥踰、羊毛、羊尾、人发、男子泊、小童溺、犬胆、犬毛、犬矢、犬、狗脬、马矢、马脑	人发、溺、头脂、燔死人头、死人骨、牛肉、黄牛胆、兔皮、兔毛、兔产脑、肪骨、人泥、乳汁
	雄鸡、黄雌鸡、白鸡	鱼、长足、地胆虫、赤蝎、庆	牡蛎		兔头肉、鹿角、鹿肉、猩皮、猪肉、彘矢、野彘肉、鼢鼠、牡鼠、牡鼠矢、彘膏、豹膏、蛇膏、牛脂、胶
	毛、鸡血、雉、鸡卵、良(蠣)、蚯蚓矢、蝙蝠、鸟卵、雄鸡矢、鸡矢	全虫蜕、蛇、龟脑、蠅、蠅、冥蚕种、蜜			新乳狗子、羊矢、牛脂、牛肉、牛胆
周家台秦简《病方》		桃蠹矢、守宫(蜥蜴)		鼢鼠	
里耶秦简	赤雄鸡冠				
《治六十病和齐汤法》	鸡卵	桑螵蛸、蟾蜍、蚕矢、蜜、斑蝥	鲤鱼胆、鲤鱼、鮑鱼	羊肝、羊肠、羊胃、羊角、弓胶、马脯、马蹄、马下齿、彘生肉、犬胆、肉酱、羖羊角、牛膏肉、狗肝、黑犬骨、黄牡牛溺、陈肉酱、狗肺、胶、猩头骨、生鼠、龙骨、羊煎脂、彘膏(彘生膏、陈彘脂、彘煎脂、彘脂、新煎彘膏)	人发、溲
敦煌汉简		蠅	头、鮑鱼、海蛤、牡蛎		
居延汉简				胶	
居延新简		桑螵蛸、石公龙			
武威汉代医简	鸡子黄	蠅、蜃虫、蚕矢、斑蝥、白蜜、桑螵蛸、地胆		猪肪、陈骆苏、白羊矢、龙骨	乳汁、人发

切成薄片,将羊肝肠胃切碎入药。

2.2 水制法 水制法即以水或其他液体辅料处理药材的方法^[16]。应用于动物药的方法主要是洗与渍,可清洁药物并利于有效成分的浸出。《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简173载“治取羊肝肠胃,謹滌(洗),細刲之”^{[14][12]}。渍,《说文解字》载“渍,漚也”^[15],意为浸泡。简帛医书中浸泡的溶剂一般是酒与醋。《五十二病方》云:“一,夕毋食,旦取丰(蜂)卵一,渍美醯一柄(杯),以飲之。”^{[12][13]}卵有特殊气味,使用醋浸泡饮用,可以矫味。《武威医简》简47中“治伏梁裹膿在胃腸之外方”使用醇酒浸泡桑螵蛸和廑虫一昼夜后分三次煮饮,“渍以淳酒五升,卒(眸)時,煮之三”^{[12][25]}。乙醇可以产生助溶和脱吸附的作用,增加化学成分的溶出,使较多化学成分易于煎出和提取^[17]。

2.3 火制法 火制法有燔、炙。燔,指用火焚烧,如《五十二病方》中燔鹿角、狸皮内服治疗蛇咬伤;《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燔人发外敷治疗金刃外伤,使用经过火烧的药物止血。这是中药制炭的早期使用经验。动物药经过火烧处理后不仅更方便存储与使用,同时也改变了药物的药性与功效,体现了古人对使用炮制方法改变药物功效的初步认识。炙法,《说文解字》曰“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15],指把物品放在火上烤。《病方》简317用烤后的牛肉外敷去除黑痣,“而取牛肉剗(剗)之,小大如黑子,而炙之炭火,令溫勿令焦”^{[12][29]}。

2.4 水火共制 这类炮制方法既要用水又要用火^[16],用于动物药的炮制方法包括煮、烹。《五十二病方》载:“煮鹿肉若野彘肉,食[之],歠(歠)汁。精。”^{[12][9]}“亨(烹)三宿雄鷄二,泔水三斗。”^{[12][20]}

2.5 干燥法 新鲜肉类不能长时间存放,否则易腐烂滋生细菌。肉类干燥处理可以延长其保存时间。《五十二病方》载“陰乾之旁(房)逢(蜂)卵,以布裹□□”^{[12][19]}、“其藥曰陰干黃牛胆”^{[12][23]}。

3 动物药的剂型与使用

3.1 散剂为主,以酒送服矫味增效 动物药常入的剂型为散剂与汤剂,其余亦有丸剂、膏剂、熨剂等。《五十二病方》《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及《武威汉代医简》等方书记载的内服药方中,散剂的数量与比例是最高的^[18]。出土文献记载的医方中动物药多经过粉碎制成散剂,内服时常常用酒送服。散剂更有利于药物成分被人体吸收,有助于快速缓解病情。李东垣在《用药法象》言:“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部分动物药具有腥臭气味难于直接服用,如蚕卵、斑蝥、狗肝等。当时的炮制技术较为简单无法完全掩盖异味。制成散剂并且用酒送服一可以帮助减轻气味便于患者服用,二可以增强药物化瘀止痛之功效。《五十二病方》载“炙蚕卵,令簍(數)簍(數)黃,治之,三指最(撮)至節,入半音(杯)酒中飲之,三、四日”^{[12][17]}。《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简106“取股(羖)羊角、少辛相半,屑(屑)之,以方寸匕取藥,直(置)酒中,歠(飲)之”^{[14][10]}。汤剂可以帮助动物药的有效成分更好析出,用法包括内服以及外用,煎煮的溶剂为水、酒。周家台秦简《病方》简324治疗痿病,“以羊矢三斗,烏頭二七,牛脂大如手,而三溫(煮)之,洗其□”^{[12][32]}。《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简166治疗女子瘕病,“取弓膠八两,搘(碎)之,大如豆,以淳酒一參煮”^{[14][20]}。

3.2 作为辅料,丰富剂型 从先秦到两汉时期,方剂由单方向复方发展。动物药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动物脂肪和蜜常作为膏剂与丸剂的辅料,丰富了秦汉时期的剂型。出土医书中以动物脂肪(猪、蛇、牛的油脂)作为辅料,将药物混合制成膏剂,多外用于治疗外科疾病。《武威汉代医简》中的膏剂,如治百病膏药方、治千金膏药方、治妇人膏药方,皆是使用动物脂肪调制。蜜可作为丸剂的辅料,在出土文献中被应用于慢性疾病,如《武威汉代医简》中治疗久咳上气、久泄肠澼;《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治疗痹病。《神农本草经》载蜜“主心腹邪气,诸惊痫痓,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和百药。”蜜不仅起到黏合作用,还可发挥补中之效。

4 动物药的应用

4.1 疾病范围 一部分简帛文献中动物药未记载治疗用途或文字损坏缺失,故对于主治功效的研究文本集中在阜阳汉简《万物》、周家台秦简《病方》、《武威汉代医简》、《五十二病方》、《治六十病和齐汤法》、里耶秦简。从疾病范围来看,动物药治疗的疾病范围广泛,主要包括外科疾病如金刃创伤、动物咬伤、烧烫伤、痔等;肺系疾病如咳、上气;心脑系统疾病癲、痫;脾胃系疾病肠澼;肝胆系疾病黃疸、伏梁;肾系疾病癃病;肢体经络疾病如痹、痿病;妇产科疾病如难产;儿科疾病如婴儿痫病;五官科疾病如目痛、目多泣。从疾病出现的次数来看,排除未记载治疗用途的药物,动物药治疗外科疾病次数最多,占比63.32%、内科疾病占比26.20%、妇科占比1.75%、五官科占比1.75%、儿科占比1.31%。一是因为《五十二病方》中记载方剂数量较其他简帛医书多且绝大多数为外科病症;二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冷兵器广泛使用,步兵、骑兵等作为新兵种投入战争,人们对创伤类、化脓类疾病有了认识^[20]。

4.2 功效

4.2.1 止血 炭类中药止血的作用被历代医家重视,并逐步形成了“炒炭止血”的理论,其用药实践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出土简帛医学文献中,人发、蛹鱼头、犬骨、羊角等动物类炭药应用于出血性疾病,如外伤出血、阴道出血。《五十二病方》中常燔人发止血,“止血出者,燔髮,以安(按)其痛。”^{[12][69]}《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简178采用犬骨、羊角、人发治疗内崩、金刃创伤与女子带下赤候,“治内崩(崩)、金傷及女子赤漏方。取全黑犬骨、羊角,燔,治,各二,燔人髮半,熬大椒(菽),取中黃者,薑、圭(桂)。”^{[14][22]}人发是应用频率较高的动物药,在不同简帛文献中多次出现,火烧后治疗出血。血余炭被收录于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主治咳血,崩漏,外伤出血。现代实验研究也证明以血余炭为原料的止血包具有较好的止血效果^[21]。

4.2.2 疗伤止痛 简帛医书中动物药多应用于外伤与皮肤病,如金伤、癰、烧烫伤、虫兽咬伤等。《五十二病方》:“令金傷毋痛方,取鼢鼠,乾而治;取鼈(鱉)魚,燔而治;□□、薪(辛)夷、甘草各與【鼢】鼠等。”^{[12][71]}《里耶秦简》简8-1057记载了与该方相似内容。现代研究证明,高原鼢鼠具有良好的镇痛抗炎作用,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可应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疏松症^[22]。狗胆,《名医别录》载其“主癰瘍恶疮”;《五十二病

方》使用犬胆外敷治疗腿部灼伤;《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简54、55使用龙骨、犬胆外敷治疗已干燥的外伤伤口。《武威汉代医简》简54使用龙骨治疗因金创肠道外露,“治金【創】腸出方:治龍骨三指撮,以鼓(豉)汁飲之,日再,三飲,腸自爲入。大良。勿傳也”^{[12][27]}。狗胆、龙骨可用于疮疡,促进伤口的恢复。

4.2.3 补虚扶正 先秦时期,药物、食物混杂使用,以食物治疗疾病是常见的。《五十二病方》具有楚地特色,对南方多见的蛇伤收方较多。本书治疗蛇伤所选用药物共19种,其中动物药8种^[23],如家禽牲畜、山珍野味比如羊肉、雄鸡、兔肉、狸皮、鹿肉等治疗蛇伤,具有补虚扶正的作用。《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简173~174治疗伤中,其言:“治取羊肝肠胃,谨(洗),细剖之,以醇酒二斗孰(熟),援去元(其)肉……食(饮)之,多少次(恣)。药尽,复为如前。”^{[14][22]}伤中,泛指五劳七伤^[14]。《黄帝内经》奠定了食疗的理论基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东汉张仲景也利用食疗方当归生姜羊肉汤,用于补虚养血。

4.2.4 活血逐瘀 简帛医书中的虫类药治疗瘀血、癥瘕,发挥活血逐瘀,散结消积的功效。《武威汉代医简》简11~12载“瘀方:乾薑歸二分,弓(芎)窮(窮)二分,牡丹二分,漏蘆(蘆)二分,桂二分,蜀椒一分,蠚一分”^{[12][25]}。现代医家常用此方治疗瘀痹痹阻型类风湿性关节炎,取得较好效果^[24~25]。《武威汉代医简》简50~51使用麿虫和蠚头治疗金创内漏血不出,服用后可达到“血立出”。《神农本草经》载蠚可“逐瘀血”,麿虫可“治血积”。张仲景创立的大黄麿虫丸中包括虻虫和麿虫,现代临床中被应用于乙肝肝纤维化、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肝硬化、慢性肾功能衰竭等^[26]。《武威汉代医简》简44~45载:“治心腹大積上下如虫(蟲)狀大惡(痛)方:班(斑)毼(蟄)十枚,地膽一枚,桂一寸,凡三物,皆并治,合和,使病者宿毋食,旦飲藥一刀圭,以肥美閉塞十日壹飲藥,如有徵,當出。”^{[12][24]}指出该方可用于治疗各种癥瘕积聚之证,包括腹部包块、肿瘤等。

5 动物药的发展

5.1 萌芽期:药食同源 先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通过细致观察与反复尝试,逐渐积累了对自然界各类物产的认识,从而确认其价值功效所在。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早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智慧,也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动物药的发展与秦汉时期人们的饮食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出土简帛医书中记载动物药137种,其中多以牛、羊、鸡、犬、猪、鱼等家畜家禽及常见水产品的部位入药,而这些动物恰恰也是秦汉时期人民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肉食来源^[27]。自先秦至秦汉,制肉食主要有烹煮、炮烤二法^[28]。《礼记·内则》载有“炙狗肝”“濡蟹”等烹饪方法,动物药的炮制方法有“煮鲤鱼”“炙蚕卵”等,与当时肉食品的加工方法相类似。这些现象体现了古人将饮食经验与医疗实践相结合的智慧,反映了秦汉时期“药食同源”的医学思想。

5.2 深化期:应用虫类药 从秦汉时期的传世医学文献与出土医简的对比研究来看,出土文献中动物药以兽类药为主。《神农本草经》记载动物药67种,《伤寒杂病论》中动物药共计24种^[29],两部传世文献中动物药种类皆以虫类药为主。较晚期

的东汉墓葬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中的动物药多是重复用药,呈现出针对瘀血积聚的疾病使用虫类药的应用特点。《伤寒杂病论》中的大黄麿虫丸、鳖甲煎丸是现代临幊上治疗肿瘤的重要方剂,可见汉代在虫类药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应用经验,虫类药的应用具有重要地位。而人部药的应用则减少,男子泡、死人肺骨、人泥、头脂等不再见于传世文献中,反映出秦汉时期药物学发展过程中对药物选择日趋理性的趋势。虫类药应用日益突出而人部药逐渐淡出的变化,构成了秦汉动物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了当时医家对药物功效认识的深化。

5.3 古今应用:存异同 出土文献中动物药的用药范围非常广泛,部分动物药的应用经验被继承发展并延续至今,如使用火烧后的动物药止血;发展药食同源的思想,食用肉类以补虚;运用虫类药治疗瘀血癥瘕。差异性方面,出土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动物药鲜用的方法,用法简便,常粉碎后外敷或内服。《神农本草经》有云“生者尤良”,鲜动物药的应用在先秦时期萌芽,在几千年医药发展中传承发展,然现代临幊由于用药安全、市场供应、缺乏完善的鲜药质量标准等原因对鲜药的使用率较低^[30],但鲜动物药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出土文献中动物药以简单炮制为主,如粉碎、火烧、浸泡。后世发展中出现新的炮制方法,现代动物药加工炮制技术更加多样,如炒法、煅法、酥法。动物药多加辅料(如酒、醋、麸皮等)炮制,具有缓和或改变药物的性能、降低或消除药物毒性等作用,如麸炒桑螵蛸、醋龟甲。

6 小结

动物药的应用历史源远流长,在中医药发展的道路不断迸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现代随着生态环境变化和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加强,某些传统动物药的应用受到限制,需要探索和寻找新的动物药资源。简帛医书中的动物药或可为现代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的经验。出土简帛医书为研究动物药的源流与早期经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中动物药共计137种,种类丰富且具有地方特色,以兽类药入药为主。动物药的炮制方法较为简单,主要为修治法与火制法,主要目的是利于贮藏、便于使用、利于有效成分的析出与矫味矫臭。动物药多入散剂,常以酒送服。从先秦到两汉时期,方剂由单方向复方发展,动物药中的脂肪与蜜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剂型。动物药主治疾病的范围广泛,并较多治疗外科疾病,功效主要为止血、疗伤止痛、补虚扶正、活血化瘀。

参考文献

- [1] 李建平,林喆,邓明鲁.中国动物药概况(续)[J].中药研究与信息,2003,5(9):24~26.
- [2] 刘洋,宋亚刚,赵日升,等.2020年版《中国药典》动物药应用特点分析[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4,30(14):218~224.
- [3] 熊益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出土文献的保护与利用[J].中医药文化,2019,14(6):28~33.
- [4] 石可金.《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动物药应用特色探析[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7(1):26~30.

- [5] 石开玉.帛书《五十二病方》禽类药考证[J].中药材,2017,40(5):1234-1237.
- [6] 陈勤.《五十二病方》中动物药应用的初步探讨[J].中国中医药杂志,1991,16(8):505-508.
- [7] 刘晓仪(LAU SIEW YEE).出土简帛和卷子中的中药内服法发展历史研究[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22.
- [8] 王铭农.动物药发展史略[J].中国农史,1989,8(2):85-90.
- [9] 柳长华,顾漫,周琦,等.四川成都天回汉墓医简的命名与学术源流考[J].文物,2017(12):58-69,1.
- [10] 陈文华.论农业考古[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272.
- [11] 周祖亮,方懿林.试论简帛医书相似方药文献的渊源与流传[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42(4):284-288.
- [12] 周祖亮,方懿林.简帛医药文献校释[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 [13]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 [14] 天回医简整理组.天回医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 [15] 许慎.说文解字:三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6] 钟赣生,杨柏灿.中药学[M].5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 [17] 李华鹏,桑立红,侯准,等.中药酒制的研究概况[J].中药材,2011,34(3):478-481.
- [18] 周登威,顾漫.基于秦汉简帛医药文献分析张仲景对早期经方医学的继承与创新[J].中医药导报,2023,29(3):189-194.
- [19] 李建平.先秦两汉量词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0.
- [20] 庞境怡,张如青.从出土简帛看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外科学[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5,33(11):2604-2607.
- [21] 朱元元,邱彦,鲁毅,等.血余炭止血包止血效果的实验研究[J].药学实践杂志,2011,29(6):431-434.
- [22] 李越峰,徐富菊,曹瑞,等.高原鼢鼠的药用价值研究进展[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8):3191-3194.
- [23] 谈宇文.《五十二病方》蛇伤方药简析[J].中华医史杂志,1999,(04):35-37.
- [24] 苏小军,王海东,田雪梅,等.辨证运用武威汉代医简方剂分期论治类风湿关节炎[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24,38(2):34-37.
- [25] 田雪梅,王海东,年芳红,等.武威汉代医简“瘀方”治疗中晚期瘀痹阻型类风湿关节炎验案举隅[J].西部中医药,2018,31(9):64-65.
- [26] 李艳杰,李闪宜,高琪,等.大黄蛰虫丸的临床应用与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世界中医药,2024,19(23):3644-3649.
- [27] 柴波.秦汉饮食文化[D].西安:西北大学,2001.
- [28]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29] 李明,丁艳亭,陶晓华.《伤寒杂病论》中动物药使用特色分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6(2):171-175.
- [30] 安一珂,彭孟凡,杨卉妍,等.中药鲜药发展史、鲜药理论及未来展望[J].中草药,2024,55(3):1046-1052.

(收稿日期:2025-03-25 编辑:时格格)

(上接第245页)

- [16] 金龙,邹英华.梗阻性黄疸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及支架植入术专家共识(2018)[J].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2019,16(1):2-7.
- [17] 庄乾竹.古代消渴病学术史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06.
- [18] 姜德友,林静.消渴病源流考[J].辽宁中医杂志,2007,34(10):1373-1375.
- [19] 宋大仁.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J].历史研究,1959(1):79-89.
- [20] 王焘.外台秘要方[M].小曾户洋,监修.日本大阪:东洋医学研究会,1981.
- [21] 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M].裘锡圭,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2] 薛含丽,段晓华,熊益亮.先秦两汉简帛文献中的外科病名研究[J].医学与哲学,2022,43(2):69-72.
- [23] 唐慎微.证类本草[M].王家葵,蒋森,点评.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1.
- [24] 严健民.五十二病方注补译[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75.
- [25] 李恒光.东汉简牍文字研究兼及书写载体转换问题:以东
- 牌楼汉简、武威医简为纲[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4.
- [26] 李俊涛.利用楚文字校读《淮南子》之“饥虎可尾”[J].出土文献,2024(3):73-77,171.
- [27] 孙思邈.千金翼方[M].小曾户洋,监修.日本大阪:东洋医学研究会,1981.
- [28] 纪征瀚,郑金生.试论中国古代的“瘀”[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2(6):19-22.
- [29] 谢容根,张丽华.恙虫病62例临床特征分析[J].广东医学,2016,37(S2):86-89.
- [30] 林洋城,孙家敏,钟华胜.恙虫病67例临床特征分析及研究[J].中外医学研究,2020,18(31):132-134.
- [31] 葛洪.肘后备急方[M].王均宁,点校.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236.
- [32] 孟跃龙.天回医简《脉书》初札[EB/OL].(2023-03-28).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011>.
- [33] 中华中医药学会.诸病源候论[M].高文柱,沈澎农,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 [34]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M].周琦,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06.

(收稿日期:2025-04-23 编辑:时格格)